

論黨內鬥爭

劉少奇

湖北人民出版社

論 党 內 斗 爭

刘 少 奇

(內 部 发 行)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1961年·武汉

(内部发行)

論党内斗争

刘少奇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1 $\frac{1}{2}$ 印张·27,000字

1961年8月第1版

196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 1106·8

定 价: (5) 0.11元

N
343.412
7294

这是刘少奇同志于1941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根据《整风文献》（订正本），“解放社”1949年9月三版重印。

一 引 言

同志們！

最近我們在黨內提出了加強黨員党性鍛煉的問題。聽說中央也通過了加強党性鍛煉的決定，不久我們就可以收到。為了加強我們黨員的党性鍛煉，我們就要在黨內開展一些具體的思想鬥爭，來反對各種違反黨性的不良現象。但是我們應該怎樣來開展黨內的思想鬥爭就算正確，又怎樣開展就算不正確呢？這便是現在我所要講的問題。

大家知道，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一個領導廣大群眾戰鬥的黨。黨為了要實現自己所負擔的歷史任務，便要和各種時期的革命的敵人鬥爭，便要和各種不同的革命的階層與階級聯合。黨從出生的那一天起，便沒有一刻鐘不是處在嚴重的戰鬥環境中。黨與無產階級是經常處在其他各種非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甚至封建殘余勢力的包圍之中。這些其他各種階級，便在同無產階級的鬥爭中，或在同無產階級的聯合中，經過黨與無產階級內部不穩定的成分，侵入到黨與無產階級的內心來，在思想意識上，在生活習慣上，在理論上，在行動上，經常影響黨與無產階級。這就是黨內各種錯誤的不良的傾向之來源，這就是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這也就是黨內鬥爭的來源。

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

我们的党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只是同党外的敌人进行斗争，并且也同党内的各种敌人的及非无产阶级的影响进行斗争。这两种斗争是有区别的，但都是必要的，在阶级实质上是共同的。如果我们党不进行这后一种斗争，不经常在党内进行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不经常在党内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克服“左”的右的机会主义，那么，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就会在党内发展，就要影响与支配我们的党，就要使党不能巩固发展，就要使党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要危害党，使党腐败下去。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就可能腐蚀我们的党或党的某些部分，就可能使我们的党或党的某些部分起质的变化，变为非无产阶级的组织。比如，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因为这样而被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所腐化，就是因为这样而变成了资产阶级式的政党，成为资产阶级主要的社会支柱。所以这种党内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也不可避免的。所以那些企图避免党内斗争的想法，那些不愿批评别人错误以便换得别人也不批评自己错误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

这种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抗。在党内，由于同志间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抗，虽然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种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的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所以没有思想原则分歧的党内斗争，同志间没有原则分歧的相互倾轧，就是一种无原则

的斗争。无内容的斗争。这种无原则无内容的斗争，在党内是完全不必要的，对党是有害无益的，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切实避免的。

党内斗争是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保证党的行动经常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路綫上进行，保持党之无产阶级的实质所完全不可缺少的。为了这个目的，党内斗争还必须在两方面来进行，必须是在两条战綫上来进行。因为敌人的思想是从两方面来影响党的，是从右面或者从“左”面来进攻党的，是在党内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的。因此，我们的党内斗争，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必须向这两方面斗争，才能保持我党的无产阶级的一定的实质。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只进行单方面的斗争，如果我们疏忽对任何一方面的警戒与斗争，那敌人就可以、而且一定从我们疏忽的一方面来进攻党，那也就不能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不能巩固党。所以党是在不断的党内两条战綫的斗争中巩固与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同志說：

“只有为拥护这一个或那一个原则而实行斗争，为了确立这一个或那一个斗争目标来进行斗争，为了选择这一个或那一个达到此目标的斗争方式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征服这些矛盾。在日常政务问题上，在纯粹带实际性质的问题上，是可以而且应该与党内抱有别种意见的人做一切妥协的。可是，假使这些问题是涉及到原则上的分歧，那么，任何妥协，任何的‘中间’路綫，都是无济于事的。在原则性质的问题上，没有而且不能有

‘中間’路綫，不是这些原則應該成为党的工作基础，便是那些原則应提在党的工作基础上。在原則問題上的‘中間’路綫，便是閉塞头脑的‘路綫’，抹杀分歧的‘路綫’，党在思想上腐化下去的‘路綫’，党在思想上死亡下去的‘路綫’。‘中間’路綫的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这是萎縮而且日趋于腐化的政党之政策。这一个政策不能不使党成为空洞的官僚主义的机关。和木偶一般，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脫离工人群众。这个道路，决不是我們的道路。”

又說：

“我們的党是在征服党内各种矛盾的过程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

这就是党内斗争的必要性。

关于党内斗争的这种必要性，关于党内自由主义与調和主义之如何要不得，在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說得很多，同志們可以去看，我在这里不多說。我現在所要說的問題，是怎样进行党内斗争的問題。這個問題对于我們來說还是一个新的問題。現在大家来研究一下這個問題，是完全必要的。現在我不想全盘的來說明這個問題，而只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經驗，就我个人所观察到的，来提出我的意見。至于这些意見是否完全正确，还請同志們大家来討論。

二 中共产生的特殊条件与 党内斗争中的偏向

同志們！馬克思、恩格斯替世界无产階級做好了什么工作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替无产階級在思想上理論上准备好了巩固的完整无缺的体系，不仅如此，他們还替无产階級建立了独立的組織，領導了无产階級的群众斗争，他們建立了第一国际，在以后又組織了第二国际及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和职工会。他們教育了并且指导了工人階級怎样組織起来，怎样进行斗争……。

在第二国际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代），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是进行了广大的組織工作，广泛的开展了組織工人階級的运动，在組織上是获得很大的成功。不过当时是在資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工人階級的組織也是在这种和平时期建立起来的，党与工会之間的区别还不很明确。特別从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后，第二国际在考茨基輩領導之下，对党內机会主义采取不可允許的調和路綫，以致机会主义腐蝕了第二国际各国党。这种党与工会，一到帝国主义时代，一到无产階級革命的时代，就显出它不能担負无产階級在新时期中所應該担負的革命的任务，以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不能不走到破产与沒落。

列宁的时代与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不同，这是帝国主义时代，資本主义快要死亡的时代，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无产阶级建立坚强的、战斗的政党，建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行动上完全巩固和統一的，并和无产阶级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政党，依靠这样的党，才能胜利的去进行极端严重的革命斗争。因此，列宁除在各方面恢复与发展了馬、恩的学說而外，还特別創立了一个完备的关于建設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学說。关于我們党的建設的学說体系，基本上是列宁創立的。这个党的建設的学說，是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完全不可分离的。

列宁創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时期的条件是怎样呢？

在当时，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大战的迫近，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迫近；而在另一方面，拥有广大組織的第二国际下的各国社会民主党，还没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还不愿意也不敢去准备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进攻，因此，第二国际各国党，在組織上也就是散漫的，派別分歧的，不能进行稍为严重的战斗，因此也就完全不能适合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要求。当时各国社会民主党，不仅在理論上、政治上陷入了右傾机会主义的泥坑（如劳資合作的理論，資本主义可以和平发展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可以經過議會斗争掌握政权、不必經過革命，因而不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等等），而且在党的組織問題上，也完全是右傾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各国党及俄国的少数党，主張党的組織上的自由主义，主張无产阶级的政党降低到普通工人組織的水平，主張党内不要

严密的組織与严格的紀律，主張无原則的党内和平，容許党內的派別(具有不同思想和組織系統的派別)存在等，对于第二国际各国党來說，党的統一与紀律，党內的自我批評与党内斗争是不可理解的，是完全不需要的。这便是第二国际各国党在組織問題上的右傾机会主义一些主要的具体表現。

在当时，还有俄国的經濟主义派，欧洲(如法国)的工团主义派等，他們主張工人階級不要有政党的組織，拒絕組織工人階級的政党，或把工人階級的政党附屬在职工会之下，主張“工会独立”，否認党对于工会的領導作用……。

在当时，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任务摆在面前，要求有一个坚强的战斗的党去領導广大群众，执行这种任务；另一方面，拥有数百万党员和工会会员的第二国际各国党又是那样的不成，那样的不能战斗，而且有組織上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想支持着这种組織上的落后与散漫。这便是列宁建設布尔塞維克党的时期之具体的重要条件。

列宁在上述这种条件下，为了建設一个能够胜任的領導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統一与巩固的政党，就不能不集中力量反对第二国际各国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尤其不能不反对他們在党的組織問題上的机会主义。列宁的布尔塞維克党最初与孟塞維克的分歧，就是在組織問題——入党条件問題上的分歧。列宁的布尔塞維克的党的建設的学說，是在反对第二国际各国党組織上的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創立起来的，是在反对經濟主义派、工团主义派不要工人政党的理論的斗争中創立起来的。所以在列宁的党的建設的学說上，就充滿了反对各种組

織上的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充滿了反对自由主义与調和主义的理論，反对把无产階級政党降低到普通工人組織水平的理論，反对党內的无原則的和平，反对党內的派別組織与派別活动等。列宁并在反对这些組織上的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确定了：党是无产階級中最觉悟、最勇敢、最进步的分⼦組織起来的最先进的部队，最有組織的部队，最有紀律的部队，而且是无产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因为无产階級不仅有党的組織，而且有职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团体以至政府、軍隊等等的組織，然而党是无产階級这一切組織中的最高形式，在政治上能够指导其他一切的組織。因此，列宁就把党和其他工人階級的組織明确的區別开来了。列宁并且确定了党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党有統一的铁的紀律。这些党的組織原則是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各国党在組織上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这些，就是列宁关于党的建設学說之主要内容。

列宁主要是在反对党的組織上的右傾机会主义斗争中来建設党的，而主要不是在反对党的組織上的“左”傾机会主义斗争中来建設党，这种情况，在十月革命以前，确是如此。当时党的組織上的“左”傾机会主义还没有发生，或者还没有发展成为系統的机会主义，所以在列宁关于党的建設的学說中，充滿了反对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即是充滿了反对不要严格的組織与紀律，反对无原則的党内和平，反对不要党內的思想斗争及害怕自我批評，反对党內的自由主义、調和主义，反对工会独立主义等。这是由于列宁建設党的时期之具体条件中产生的。

但是，如果我們說到中国共产党的建設的具体条件，那就和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那时候的条件完全不相同。

第一，中国党的建設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是在俄国布尔塞維克已經取得胜利，有了活的榜样以后，所以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則去进行建設的。

第二，中国党从开始到現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沒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

第三，中国沒有欧洲那样的資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容許工人階級和平的議會斗争，也沒有欧洲那样的工人貴族阶层。

第四，在中国党内小資产階級和农民的成分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并有若干游民成分，这是中国党内“左”右傾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

由于前面四个条件，就使我們中国党的建設，一开始在主觀上就是按照列宁的原則和道路进行的。布尔塞維克党的一些組織原則，在我們多数的黨員中都能背誦出来。而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傳統与习惯，在我們党内是沒有的。因此，就使我們走了許多直路。我們的党从最初組織起就有自我批評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組織与紀律，就不允許派別的存在，就严厉的反对了自由主义、工会独立主义、經濟主义等，因此在我們党内公开提出系統的組織上的右傾机会主义的理論，是还没有的。認為不要自我批評，不要党内斗争，不要严格的組織与紀律，不要工人政党及工会独立等等主張，在党内是不能公开发展的。虽則我們党内的思想斗争是还有不够的地方，但那还是由于理論水平

的低下，不能看出原則上的分歧，或者是被黨內個別負責人採用非常辦法壓制自我批評的結果，而不是由於黨內有什麼系統的反對黨內鬥爭的理論。

但是建立我們中國黨的時期的這些特殊條件與特殊情況，是發生兩方面的影響的：一方面是好的，使我們一開始就建立了一個列寧式的中國共產黨，在主觀上嚴格的遵循着列寧的原則，這個黨一開始就有嚴格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伴隨着，因此使我黨進步得很快，這是推動我黨進步的一種原動力。但是另一方面，又使我們的同志常常走到另一個極端，犯了另一個錯誤，就是常常使我們黨內的鬥爭進行得過火，鬥爭得太厲害，毫無限制的鬥下去，走到了另一個偏向，“左”傾的偏向……。

許多同志是機械的錯誤的了解列寧的原則，把列寧的原則絕對化。他們認為：黨在組織上的高度集中，就否定了黨內的民主；黨內鬥爭的必要，就否定了黨內和平；黨為無產階級組織之最高形式——在政治上領導其他一切無產階級的群眾組織，就否定了工會及其他工人的與勞苦群眾的組織之獨立性；統一的鐵的紀律，就消滅了黨員個人的個性及黨員的自動性與創造性……。

許多同志是死記着列寧的原則，認為黨內鬥爭是必要的，自由主義、調和主義是要不得的。但他們是機械的死板的運用這些原則，他們以為在黨內不論在什麼時候，不論在什麼情況之下，不論在什麼問題上，都應該而且必須進行不妥協的鬥爭，而且是鬥爭得愈凶愈好。黨內鬥爭的方式，黨內批評的方式，愈激烈愈尖刻就愈好。同志間在黨內的對抗，

愈尖銳就愈好。不然，就会要犯自由主义、調和主义的錯誤。为了要証明自己沒有自由主义与調和主义，并証明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布尔塞維克”起見，他們就离开時間空間的具体条件，在党内进行无原則的斗争。如是，这些人也就成为党内斗争中沒有立場的“打手”，无原則的“斗争家”，嗜好斗争的“斗毆家”，为斗争而斗争。这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醜事，这当然不能証明他們是“十足的布尔塞維克”，而只能証明他們对于布尔塞維克的侮辱，并把布尔塞維克的名詞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

許多同志不了解：党内斗争是原則的斗争，是为拥护这一个或那一个原則而实行斗争，为确立这一个或那一个斗争目标来进行斗争，为选择这一个或那一个达此目标的斗争方式而斗争。他們不懂得：在日常政务問題上，在純粹帶实际性質的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該与党内抱有別种意見的人做一切妥協的。他們不懂得与不了解：在原則性的問題上，在确立斗争目标的問題上，在选择达此目标的斗争方式的問題上，是應該和党内抱有別种意見的人进行不調和的斗争的；而在日常政务問題上，在純粹帶实际性質的問題上，只要这些問題不涉及原則上的分歧；就不應該和党内抱有別种意見的人实行不調和的斗争，而應該做一切的妥協。这些正是列宁、斯大林的党所固有的作风，但是沒有被我們許多同志学到。他們在这些应作一切妥協的問題上，也实行不妥協的斗争，于是他們就沒有不对抗的問題，沒有不对抗的时候，沒有不对抗的人。一切与他們不同的地方，他們都要实行对抗，强使其絕對的相同，他們是一切都不妥協，絕對不妥協。

他們把一切的矛盾都看成對抗，對抗是一切。這就是他們的絕對主義。

許多同志不了解：什麼是原則，什麼是屬於原則的問題，什麼是黨的戰略計劃與策略路線，並抓住這些原則問題、這些關於戰略計劃與策略路線問題上的分歧，來進行鬥爭。他們的理論水平與政治經驗，還是格外的低下，他們還抓不到這些關係重大的問題，並為了這些問題來進行爭論。然而他們又死死記得在黨內是要鬥爭的，不鬥爭是不對的。他們雖抓不到這些重大問題，不能從原則上去提出問題，可是他們還是要鬥爭的。於是他們就只能抓住個別的现象，個別的問題，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來實行無內容、無原則的鬥爭與爭論了，並因此而造成同志間的不團結，互相對抗，及組織上的分歧。這種黨內鬥爭中的惡劣現象，在我們黨內是存在的。

上述這些，是中國黨內鬥爭中的一種偏向，是在中國黨內特別嚴重的（在外國黨內雖然也有）一種偏向，是黨內鬥爭進行得過火、進行得毫無限制，走到另一個極端——黨內鬥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黨的組織上的“左”傾機會主義（否定黨內民主，否定原則上一致的黨內和平，否定工會及其他群眾組織的相對的獨立性，否定黨員的個性及其自動性、創造性等）。這是由於中國黨的特殊環境與特殊條件產生的。

在這裡，還要說到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原則鬥爭沒有被中國黨的許多同志所注意這一事實。十月革命後，俄國黨內產生了“左”派共產主義的一派，他們反對布列斯特和約，在以後又有关于工會問題的爭論。十月

革命以前，在布尔塞維克內部虽也有过以“左”的面目出現的召回派一派入，但不久即被克服；不如布列斯特和約时期“左”派共产主义的严重。俄国这一“左”派不久也被列宁克服了。但在西欧各国又产生了“左”派共产主义，他們提出“不做任何妥协”的口号，反对参加国会，反对合法斗争，反对与社会民主党左翼进行必要的联合。在这种情形下，列宁就在一九二〇年四月間写了“共产主义左派的幼稚病”一書，以糾正这种傾向。因为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从前不相信无产阶级可以夺取政权的，现在有了活的事实，給了右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就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左”傾机会主义，以为革命可以不經過任何迂迴道路，一个早晨就可以胜利。这种情緒，中国党内正是发生过，在某些时期內并且占了統治的地位。犯这种錯誤的人們完全不注意列宁論左派幼稚病一書的重要性，在政治上反对迂迴，反对等待，提倡少数先鋒队可以不顧广大群众还没有跟得上来的事实，就实行冒險的进攻，反而罵其他的人为“右傾机会主义”。一切組織上右傾或“左”傾的机会主义，都是从政治上的右傾或“左”傾而来的。中国党内既在某些时期犯过政治上右傾或“左”傾的錯誤，于是也就在組織上犯了这种錯誤。而特别是在內战时期犯过冒險的“左”傾錯誤，于是在組織上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就产生了。

因此，在中国党内斗争問題上，如果可以这样来分的话，那么就存在着以下三种偏向：第一是党内的自由主义与調和主义。第二是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党的組織上及党内斗争中的“左”傾机会主义。第三是党内无原則的糾紛与斗争。